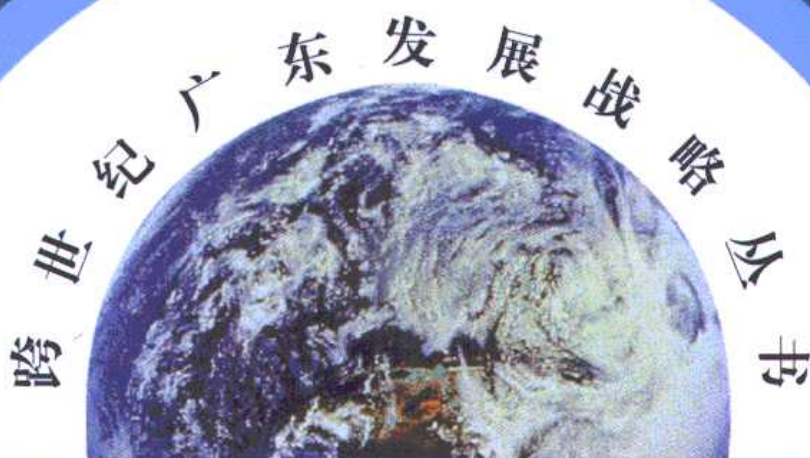


跨

世纪的 广东农业

袁志清 罗必良 主编



F327.65 402

Y89

广东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策划
跨世纪广东发展战略丛书编委会编
国家“九五”规划图书出版重点项目

跨世纪的广东农业

袁志清 罗必良 主编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世纪的广东农业/袁志清, 罗必良主编.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9

(跨世纪广东发展战略丛书/丁励松等主编)

ISBN 7-5361-2408-2

I. 跨… II. ①袁… ②罗… III. 农业经济-研究-广东
IV. F3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591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4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24.00 元

前 言

世界各国的实践反复证明，一个健全的农业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经常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的长盛不衰，有力地支持了其社会经济的稳定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 50 年代对农业的轻视，导致了经济发展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共同说明，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忽视农业所付出的代价决不只是由农业来承担。

理论研究表明，在一个开放的国家经济中，优先发展哪一种产业不仅取决于国内市场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国内和国际市场交换的比较利益。不能简单地从国内居民的消费结构和产值结构中农业所占份额的下降得出农业必然衰退的结论。考虑到农产品的必需性与不可替代性、消费结构的多样性、区域的异质性以及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农业都可以成为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重要产业，对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一个区域来说也同样如此。

广东独特的地理区域优势与明显的经济外向型特征，决定了广东农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也决定了农业在广东经济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在即将走完 20 世纪的历史时刻，回顾广东农业的发展历程，剖析广东农业的现实格局，把握广东农业的比较优势与未来发展方向，从而构建跨世纪广东农业发展的模式体系，就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促进广东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指导作用与政策咨询价值。

本书共分12章。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1~5章侧重于广东农业发展的“总结与评价”，分别对广东农业体制变迁进行回顾与总结、对工业化背景下广东农业格局与增长轨迹进行分析，并基于比较优势的把握提出广东农业发展的方向与重点。作为本书的第二部分，第6~12章侧重于跨世纪广东农业发展的“模式体系构建”，提出“现代持续农业体系”新概念，对其涵盖的生产体系、产业化经营体系、技术体系、市场化运行体系、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区域布局体系进行深入探讨与设计。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写作大纲由两位作者共同讨论形成，其中第1~5章、第10章由罗必良教授执笔，第6~9章、第11~12章由袁志清研究员执笔。

本书从选题的确定、写作大纲的修订到具体写作，得到了马恩成和丁励松两位专家提出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写作过程中，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的温思美教授，以及研究生许斌、张伟、伍晶、陈凤者、刘宪法、腾飞等，也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帮助。

两位作者，尽管一老一少，却对农业问题同样十分关注，有机会把对广东农业发展问题的思考表达出来，应该归功于广东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对广东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为本书提供的研究及出版资助，对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及责任编辑的高效工作与负责精神，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作 者

1999年5月1日

第一章 导 论

在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村及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全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持久性因素。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始终是一个大题目，它应该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发展的主题。中国的社会主体是农村，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而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农为生。由此，农业问题不解决好，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农民贫困，国家就不可能富裕；农村不发达，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最终是要通过农业的现代化、农村的现代化与农民的现代化来表达的。中国的特殊国情赋予了中国农业、农村以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解决好农业、农村问题，将构筑起社会经济持久发展与稳定的基石。对广东而言，也同样如此。

第一节 农业发展理论概述

农业是发展中国家一个十分重要的产业。然而，如何看待农业，农业在经济发展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与发展策略选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可以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深化过程。在

本世纪的整个 50 年代，经济增长模型所设置的农业变量，都处于被动作用的位置。那时，带有普遍性的看法是，农业作为一个趋于衰退的产业，其任务只是为工业提供积累。这就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60 年代随着对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相互依赖关系认识的提高，经济学家对农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许多学者从理论上和经验上论证了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发展的必要性。正如罗斯托（W.W.Rostow）1963 年所说，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多重的作用，这些作用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Myrdal）1968 年也指出：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70 年代以来，人们在谋求公平的增长过程中，更加重视起农业和乡村发展问题。

在 50 年代的经济理论中，争论最大、影响最深的当属“二元经济论”创立者刘易斯（W.A.Lewis）1954 年提出的“零值劳动力”理论。刘易斯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增长迅速，单位土地上劳动力的增加使得劳动生产率下降，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增加的结果是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直到劳动力增加的边际产出为零。如果将这些“零值劳动力”转移出去，不仅不会影响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在工业中的劳动会增加工业品产量，从而提高整个国家的收入水平。因此，刘易斯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产业结构转型，也就是应该优先发展工业。

50 年代对农业的相对轻视还受到了另外几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源于对恩格尔定律的诠释。恩格尔定律是指在人均收入较低时，消费结构中食品占的比重较高，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比重趋于下降。食品主要来自农业。由于人们对食品需求的增长慢于总消费的增长，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也将随经济的增长而下降。由此断定农业是一个必将衰退的产业，

轻视向农业部门投资，主张优先发展工业。

二是普雷维希（R.Previsch）和辛格（H.W.Singer）的命题。这两人于 1949 年分别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命题，即出口原料和进口工业品从长期趋势来看存在一种于国不利的贸易交换关系。他们由此断定，通过农业和其他原材料出口所推动的增长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他们主张优先发展工业品的进口替代，而不是优先考虑农业出口生产。由此农业在国际贸易中长期衰退的假设成为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计划人员的一个信条，因而轻视农业在发展中的潜在作用的倾向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三是赫希曼（A.O.Hirschman）1958 年提出的“连接环节”（或关联效应）理论。赫希曼认为，由于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金有限，应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能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最大联动（促进）作用的产业中去。从这一前提出发，他提出了连接环节的概念，认为应将有限的资金投入连接环节最长的产业中去。他断言：“农业必然缺乏通过联动作用创立新的投资活动的直接推动力，这是农业很大的弱点——而工业在这方面却具有压倒的优势。”从而得出结论：投资于工业总是要比投资于农业更能使经济更快和更稳健地增长。赫氏的分析再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工业品的进口替代的政策取向。

轻视农业的理论和观点曾风行一时，对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牺牲农业片面追求工业发展不无影响。事实上，遵循这些理论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其结果不仅农业凋敝，工业发展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到了 60 年代，刘易斯的理论却引起了人们对农业与工业增长之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强调。1961 年乔根森（D.Jorgenson）在一篇论文中将刘易斯的古典模型与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加以比较，认为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依赖于农业剩余的增长率。分析表明，食品短缺将使劳动供给小于无限弹性，从而会抑制非农部门的增

长。结论是：为了避免跌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一个国家在发展的早期可能需要在农业方面付出一些净投资，以便加速农业剩余的增长。

此外，约翰斯顿和梅罗尔、拉尼斯和费、尼科尔斯都论证了农业发展对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极端重要性，有助于把农业视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潜在积极力量，从而促成了一场关于农业与工业增长相互依赖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不仅有助于人们对农业与工业之间相互依赖性以及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認識，而且也强化了对农业增长过程本身重要性的认识。

1964年，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T.W.Schultz）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穷而有效率”的假说，驳斥了两种长期流行而且影响深远的观点：即一种是认为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另一种是有名的隐蔽失业理论（即零值劳动理论）。他反对轻视农业的看法，强调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作贡献的，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如何改造传统农业成了他在此书中研究的中心问题。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要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他呼吁来一个由农业推广到农业研究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大转变，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舒尔茨的研究获得了普遍的肯定，但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说明什么样的技术要素是新的有利的技术要素，以及这样的技术要素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直到60年代后期美国的拉坦（Ruttan）和日本的速水佑次郎提出“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才得到了较好说明。拉坦和速水在分别研究了美国和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历程后认为，一条真正有效的农业发展道路应该能够提供补充那种最稀缺要素技术的道路，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不取决于技术的可能性，而取决于这种技术的经济可能性。由于新技

术的经济可行性因各个国家资源条件不同，因而技术创新的方向也会受到影响。在人少地多的国家或地区，技术创新被导向创造劳动力替代的新技术（如美国主要是机械化），而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则会被导向土地替代的要素（如日本主要是化肥、良种、水利化等）。拉坦和速水把这种因适应于各个地区不同的要素相对价格而产生的技术创新称为“诱致性技术创新”。这一概念已得到农业经济学家和农村政策制定者的广泛重视。

70年代以后，人们不仅对50年代有关农业的认识进行了反思，而且还跳出农业本身，将农业与工业（城市）的发展、收入分配、就业和政治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史蒂文斯（R.D.Stevens）等人于1988年指出，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农业对其他部门的贡献：一是增加国内城市消费和其他农产品的供应；二是向非农业提供剩余劳动力；三是向其他部门提供投资所需的资本；四是增加农业部门对其他部门的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加塔克（S.Ghatak）等人1984年认为，农业之所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主要表现在：一是在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增加食品与农产品原料供给；二是通过增加乡村部门的购买力以扩大国内工业品市场；三是便于非农产业所需的资源在部门间的转移；四是通过农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事实上，农业不仅为国民经济增长作出了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及外汇贡献，而且承担着对社会公共部门保障供给的作用，农业生产的社会公共收益往往高于农民的直接收益。因此，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密切关联，意味着忽视农业所付出的代价决不只是由农业来承担。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表明：一个健全的农业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第二节 邓小平理论的农业观

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近20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个领域的发展都体现出“有中国特色”。广东的农业、农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迅速发展，从贫穷逐步变为“小康”。今后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邓小平理论，以推进农村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农业观，可概括为下列几个方面：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稳定的农村基础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这一揭示在经济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前人所不曾论述的。对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是与非，他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③邓小平认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首先在农村推行改革，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他说：“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好起来。”^① 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②。在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形式上，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劳动力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积极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是农村改革和发展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邓小平指出：“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③ 因此农村经济组织采取什么形式，实行什么制度，都应服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需要，都应尊重农民的要求和愿望。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达到共同富裕。广东 20 多年来，坚持邓小平的生产力论，在农村改革中，凡是能促进生产力提高，而农民又自愿做的，就支持、鼓励农民去做。不论在土地制度、产业结构还是生产、经营、流通、分配等形式，都以是否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作判断标准，形成多样化，使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二、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实现“两个飞跃”

邓小平认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④ 他对农村改革的许多指示和理论概括，科学地总结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历程。明确地把计划和市场看成是两种经济手段，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又一个重大创新，指明了深化改革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他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77～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6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邓小平文选》，第 1 卷，323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78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①农村的“第一个飞跃”，重新确认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确立了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极大地调动起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优化了生产要素组合，农民经济收益大幅度增长。这一阶段的改革使家庭经营成为农村中最基础的生产单位和经营层次，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农村的微观组织基础，使农民成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主体，能够积累自己的财产，使一部分农民和一部分地区率先富裕起来。“第二个飞跃”的重点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生产式的家庭经营与大市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小生产式的家庭经营，难以使农业资源、资金、劳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形成最佳组合。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就必须发展集约经营，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的规模经济，涉及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和变动，反映出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进行这项改革，要视条件是否成熟，一定要遵循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农民自愿两条基本原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农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很大的前进，但又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要在推进农业企业化过程中发展集体经济、解决规模经营，带动家庭经营纳入现代农业的产销体系。

三、工农业要协调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

邓小平指出，发展工业要“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②。认为“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③。他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① 农业为工业发展提供粮食、原料、资金、劳动力、工业品市场；发展工业可大量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工业人口和收入增加能开创一个畅旺的农产品市场，工业产品能为农业供应生产资料，提高物质技术水平，工业资金积累快，可为支农、补农投资现代农业创造条件，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能大大增强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辐射能力。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异军突起……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②。又说：“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③ 广东的实践表明，农业发展为推进工业化作出贡献，工业化又促进农业集约化、专业化、社会化，向现代农业发展。

四、科技进步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邓小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认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④，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第一生产力就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的第一位因素。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⑤ 又说：“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⑥ 科技进步是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的火车头，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起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2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导作用。科学技术能变革劳动对象、变革劳动资料、提高劳动者的能力，并能使三者在新的水平上实现更佳组合。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对象是生物体，要靠科学技术变革生物体，才能使农产品的产量、品质突破新水平。

邓小平把发展高科技摆在极重要的地位，指出：“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①，“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②对高科技应用于农业更是高瞻远瞩，他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③当今人类社会，正努力寻求社会、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互促进、相互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人口不断增长，土地资源有限，人均占有的土地愈来愈少，人类对食品供应优化环境的要求则越来越高，靠消耗土地资源难以解决问题，必须靠高新技术大大提高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力高度发展，有可能用很少土地养活很多人口，并提供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消除土地—人口承载力的过重负荷，最终解决农业持续发展问题，世世代代造福人类社会。

第三节 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今天，许多经济学家已开始认识到，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远非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辅助部门。一般来说，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部门，在任何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战略中应该是起能动作用的主导部门——至少是就当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来说应该如此。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所指出的：经济发展长期斗争的成败取决于农业部门。罗斯托也认为，农业

^① ^②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应该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绝对必要条件。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个问题，即有人依据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下降的必然性，从而否定农业的基础地位，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基础性”不是因为比重大，而是因为从根本上制约了其他部门发展而成为它们发展的前提。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一个健全的农业部门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经常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农业是工业化的基础，这一说法至少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没有农业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工业化就无法起步，工业化伊始所需要的劳动力和资本主要来自农业；二是指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农业都要起推动工业发展的作用。这表明，在部门发展顺序上首先是农业的发展，然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农业始终是工业的基础，在生产结构、市场、劳动力、资金各个方面支持工业化的进程，并与之协调发展。

工业化的发展首先必须取决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点是社会经济的双元结构，即一大块传统的落后农村中的农业与一小块相对现代化城市中的工业并存。由于传统农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尤其是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十分困难。舒尔茨的研究表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传统的二元结构中，农业的增长基本上依赖于农业劳动力的量的增长。另有研究表明：在我国农业劳动力的投入量每增加 1%，农业总产值可增长 0.5996%，而物质费用消耗每增长 1%，仅使农业总产值增长 0.17%。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农业劳动力很丰富，但不能说有绝对的剩余劳动力存在。可见，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必须先发展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将危害农业。

在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最大，因而工业化所需资金不能不以农业为主要来源。此时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农业的援助能力。对于比较贫困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工业化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的扩大。尽管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居民，但由于农村人口的庞大，因此其市场规模一般大于城市。显然，如果农村购买力低下，工业化的进程将受到严重阻碍；相反，农业产量和收入的增加就可消除这种阻碍，使工业化迅速发展。

发展中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农业发展对工业化依然十分重要。随着非农产业中劳动力的相对增长，中等收入国家需要重视农业，更努力地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率，否则或者要被迫进口大量的粮食，降低工业化的速度，或者将面临由于粮食价格上涨而引起通货膨胀的威胁。农业必须持续地、积极地为扩大的工业部门提供必不可少的农产品。

事实上，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农业不仅作出了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及外汇贡献，而且还承担着社会公共部门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企业的生产经营都与其他企业相关联，所有这些企业都依赖于一定的公共部门。这种公共部门提供满足社会性需要、对社会全局或长远有用的公共物品，这种公共物品是所有企业生产经营共同的基本条件。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就越多越迫切。农业正是一个公共部门。由此看来，农业本身是一种外部经济，农业生产的社会公共效益往往高于农民的直接收益。因此，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密切关联，忽视农业所付出的代价不只是由农业来承担。

从国民经济部门结构长期发展演变的角度来看，人类经济发展大体可分为传统一元经济、二元经济和现代一元经济三个阶段。与此相应的工农关系特征是：在传统一元经济阶段，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居主导地位，工农关系的矛盾尚不明显；在现代一